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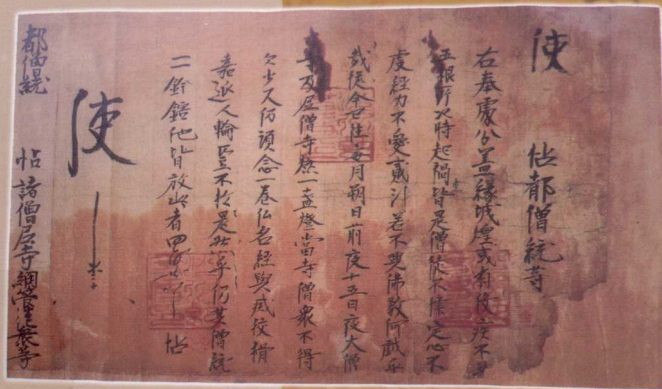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吐鲁番

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

黑维强 © 著



貴州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

吐鲁番

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

黑维强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黑维强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1

(敦煌学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8908 - 6

I. ①敦… II. ①黑… III. ①敦煌学—词汇—研究
IV. ①H134②K87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720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彭学云 王 欣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s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525 千字

印 张:18. 875

定 价:44.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908 - 6/H · 765(汉 23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4BYY015)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 敦 煌 学 博 士 文 库 ◆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錡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敦煌学博士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因此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敦煌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才培养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才能出产一流的研究成果。

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初就引起老一代敦煌学家的关注。在季羨林、姜亮夫等先生的倡导下，1983 年在兰州大学、杭州大学连续举办了两届敦煌学讲习班，而后国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他高校利用其他专业设置敦煌学研究方向，培养敦煌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98 年，国家考虑到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样敦煌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业齐全的人才培养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授权点是由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国内唯一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双方很早就有良好的合作基础，1980 年，兰州大学聘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敦煌学课程，1982 年起联合招收培养敦煌学硕士学位研究生。1998 年联合申报的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形成

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又于1999年联合建成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入校开始学习。为了培养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并考虑到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各自特点，因此在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上、博士研究生的管理培养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套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本专业行之有效的最好的模式。敦煌研究院集中了一批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和敦煌区域史的研究上有很大优势，联合共建之后可以优势互补。为了将这一优势体现在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上，使研究生在文献史地研究和佛教艺术研究上得到全面培养，敦煌学专业采取交互式的双导师制，这样既方便在校管理，同时也方便在敦煌石窟学习考察期间的指导，更便于博士生在以后的研究中充分利用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特别是在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上，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敦煌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优势。在敦煌学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体现联合共建这一地缘优势。第一是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并重，教学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注意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将部分博士生的课程放到敦煌石窟中去教学，教学效果非常好；第二是博士生的研究及学位论文同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或项目结合起来，这样既便于博士生了解学术界研究动态并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也利于提高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水平如何，主要依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来体现。为了使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尽早与学术界见面，同时也使学术界对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培养的博士水平有一个全面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协商，各自拿出一部分经费，与民族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敦煌学博士文丛，挑选学术水准达到要求的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出版，以利于这些博士们的成长。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

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敦煌学重点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年建成985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步发挥了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通过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拟筹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这样便于同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丰富，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编等大型图书，及其近年或者以前国内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了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

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对留学生的授课与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并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在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1945年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的研究成果及时体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今后，我们还要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出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人才的培养中心。

序

郭芹纳

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离不开对学业的执着追求和持之以恒的认真与刻苦。看到黑维强博士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联想到他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我不禁想起了他艰苦、勤奋的求学历程。

黑维强由绥德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绥德县一所名叫薛家崂的中学任教。对于工作，他是认真的，因此，曾经获得榆林地区“先进教师”的称号。正是因为认真，所以，他并不满足于既有的知识水平；于是，他刻苦求学，通过了国家自学考试，获得了大专文凭；接着，又一鼓作气，考入陕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他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脱产学习机会，学习期间，每有可能，便到我们陕西师范大学来听课，力求用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这些情况，是他考取硕士研究生之后，我才陆续了解的。他考取硕士研究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陕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而又回榆林电大工作五年之后，他才考上我们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其间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他家境贫寒，有年迈的老父，还有残疾的兄弟……他大约是经历了两三次之后，才通过研究生考试的。在成绩合格但需要破格录取之后，他第一次找到我，简述了他的求学经历，表达了希望继续提高的愿望。黑维强给我的印象是朴实上进而内涵淳深，我立即产生了录取他的念头。这时，我院一位同行托人转告我，希望将我的招收名额让给他，原因是他答应在今年录取去年落选的一位考生。这个要求令我为难——满足了这位教师的要

求，则无法面对一位已过而立之年且对语言研究有着执着追求的实诚厚朴的考生。在我难以取舍的时候，黑维强对我说，要不然就答应那位老师吧，不要因此而影响教师之间的关系。黑维强的话令我感动，我终于下定决心，宁可得罪本院的老师，也要破格录取他。记得我当时特意写了一份申请来说明情况。申请书的多数内容我早已忘却，只有一句话却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最后的结束部分，我强调指出，他“才堪造就，故当录取”。时至今日，我不知道那位教师是否埋怨我，也不知道那位被许诺的不知名姓的考生是否怨恨我，但是，黑维强终于以他优异的成就证实了我的预言，他的确是“才堪造就”的。

因为家中的负担沉重，黑维强的生活便非常简单：常常是用煤气炉煮一碗面条，加上几根青菜，就是一顿饭。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减弱他的奋进之志。他的学年论文写得很好，毕业论文写得更好——这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西安的高校不能解决他的家属问题，他只得选择了常州师范学校（现常州工学院）。我想到前人谈到的治学的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有经济基础，便安慰他说，你去南方吧，首先解决好自己的生活问题。生活且难保证，何谈治学？写到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常州师范学校，感谢江苏省的人们：是他们给黑维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由于学校的性质所限，他在常州师范学校难以发挥专业特长。但是，他没有放弃，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1999，他获得了常州市教委的嘉奖），他抓紧一切时间，不断地、认真地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从1997年毕业到2002年的五年间，他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可以想见，这些年中，他是在怎样地刻苦着，努力着。

正是出于对学业的执着追求，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又考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师从敦煌学名家郑炳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里，我还要感谢常州师范学校对他的支持）。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为了一个又一个词语而去查阅资料，一

坐便是一天。终日伏案，使他的腰肌劳损，脊椎疼痛。就是在这样的奋斗中，他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得到了评审教师的好评。记得当年评审他的论文时，我感动而欣慰，在评语中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读罢全文，我们欣喜地看到，黑维强博士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与钻研，在学术方面已经成熟，其积累日深，造诣日高，日将月就，必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现在，他的成果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这些身为人师者，怎么能不又一次为之欣喜呢？

和那些富二代、文二代不同，黑维强没有社会背景，无所依赖，有的只是认真和刻苦。因贫穷而立志，因立志而勤奋，因勤奋而长息成就，这就是一个有志于语言文字研究者的成长之路。他的成就，再一次使我深深地感到，一个真正的研究生，不是混出来的，而是用他们呕心沥血般的辛劳奋斗来的。

黑维强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家境贫寒，在生活最为艰苦的日子里，父母将家中仅有的一口粮食拿出，让我读书，他们去吞糠咽菜。父母没有讲过一句大道理的话，只是默默地做着他们能为我做的一切。现在父母年迈多病，该我回报的时候了，但是除了让他们为我操心外，我什么也不能给他们……”读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不禁令人伤哀叹惋。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而哪个读书人没有同样的憾恨呢？我曾为自己的母亲献上这样一副对联：“忠孝难全千载戚戚游子泪，贫贱易守万古悠悠慈母心。”就连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先生也无同样的遗憾：“亲方困饿儿无米，儿始宽馀亲已仙！”（见《九十思亲七首》）如此看来，黑维强也就不必过于自责了——著作出版之际，便是告慰父母之时。如今，黑维强的著作即将出版，我想，他的去世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当今之世，出书者众，而肯下死功夫者日见其鲜；就研究生言，人人皆写论文，然以其青春的生命去拼搏而成就高质量的论文者，似亦显其微。黑维强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我有感于此，思忖

再三，认为作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特色与创见，书中都说得十分明了，奚俟赘言？感其坚志求学而不移其心，因而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聊以为序。

郭芹纳

撰于公元2010年10月30日

凡 例

一、“社会经济文献”一语所指文献主要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所确定的文献。

二、吐鲁番文献比敦煌文献在时代上要早一些，题目及行文中把“敦煌”放在了“吐鲁番”前，是遵循习惯。在考释词语引例中，一般按时代早晚，将吐鲁番文献列在前，敦煌文献排在后。

三、行文和引例中引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将题目作了技术处理：把表明年代的“公元某某年”字样，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不用“公元”、“年”字样；原文献中用来表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卷号的“斯”、“伯”，在本书中分别用“S.”、“P.”表示；对俄藏敦煌文献，在卷号前用“Дх.”表示（Дх. 是俄文“敦煌”的缩写）；“背”用“V”表示。其余格式一依原样，不作任何改动。

四、引用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较长者，在题目后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加上“行”字，表示该词语所在的行数，以便于查阅。在征引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例句后，在圆括号内依次注明该文献的简称、册数和页码，并以“/”分隔册数和页码，如“（释录 3/231）”，“3”表示册数，“231”表示页码。若一词分在两页或两行，则按第一字所在的页码或行数标注。页码前有“补”者，表示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补遗》部分。如【命过】引例中的“（吐4/补4）”。行文和引例中的敦煌、吐鲁番书名所用简称，参见本书附录二。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外的例子，不标页码。

引用常见传世文献时，不注明编著者，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引用的文章、诗词，则注明作者及时代。佛教典籍一般用《大正新修大藏经》，用单行本者，见书末引用文献。

五、敦煌、吐鲁番原文献中空缺字数不清楚的前残、中残、后残符号，本书为排版方便，一律使用“□”表示。空缺字数明确的，用“□”表示。引文中的其他符号一依原文面貌，不作任何改动。

六、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多为写本，用异体字的现象突出，本书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用通行字体。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同音字、近音字互相替代现象突出，这些替代字有别于传统文字学中的通假字，本书采用黄征的说法^①，统称为“借音字”。

七、引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录校本的例子，如果其中有文字误录、漏录等问题，根据图版本径直改正，一般不作说明。

八、为避免繁复，本书所释词语，如果《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在该词条的右上角用“*”表示。如【**奥典***】。

九、为行文简洁，在征引前哲时贤之说时，名字后未加“先生”字样，祈请见谅。

^① 参见黄征：《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前 言

唐五代时期是汉语发展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近代汉语始于这一阶段。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有年代记载的是406—1002年，^①大致历经六个世纪；吐鲁番文献有年代记载的是273—769年，^②大约为五个世纪。两种文献虽然跨越时代较长，但是主体部分在唐五代。因此，敦煌、吐鲁番文献主体部分属于近代汉语研究领域。

近代汉语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七八十年，目前处于研究的一个发展时期。从研究现状来看，词汇部分的成果虽然相对于语音、语法要多一些，但也还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理论性的著作不多，开拓性研究领域还很大，许多有代表性的文献词汇尚未研究，或者说涉及不多。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就属于涉及不多的文献，目前仅有零星的词语考释，还没有整体上的探索。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是近代汉语始发阶段最有代表性文献之一，研究得很少，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本书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为对象，对其词汇进行较为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①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 参见饶宗颐：《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王素）·序》，1页：273—640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吐鲁番出土文书·编后记》10册，1991，336页：367—76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简介

(一)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说光绪二十五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所藏的一千年以前五万多件文献,不论从数量看,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都令人惊叹不已。伴随着这些文献在海内外的刊布、研究,学术界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陈寅恪在1930年《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①敦煌文献发现至今虽已一个世纪,但敦煌学并未被冷落,仍保持着其青春活力。

吐鲁番文书主要是指吐鲁番地区的今高昌故城附近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古墓葬中所发掘的各类内容的文献。它是与敦煌文献性质类似的文献。吐鲁番出土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是在19世纪末,迄今也已有一百余年了。^②吐鲁番文书也包括高昌故城以外新疆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献,数量不多。从文献出土的时间看,可以分为解放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处于国家动荡不安、社会混乱无序之时,东西方一些国家的所谓探险家们,以各种借口在吐鲁番地区大量盗掘古墓,劫掠了一大批文书。第二阶段是解放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专业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的古墓葬进行了科学有序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它们也就是现在所见吐鲁番文书的主要部分。此外,1975年以后,也出土了不少的文书。^③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关于吐鲁番文献的发现时代,学界有二说:一是传统的观点,即1889年俄国刻列门兹到吐鲁番盗掘;二是近年的新见解,即所谓1882年《北京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的发现。参见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64~6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③ 参见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71~7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敦煌、吐鲁番文献出自邻近的两个地方，但其被盗掠和盗掘的过程，却十分相似。英、法、俄、德、日等国的所谓探险家们，不仅盗掠敦煌文献，同时也盗掘吐鲁番文献，这说明这两种文献具有相同的魅力，大概也是二者能够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敦煌文献有汉语与非汉语两大类。汉语类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数量最多，其他内容的文献数量较少。非佛教典籍的文献，包括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俗文学和社会经济类文献。本课题研究的是后者，即非文学的社会经济部分。吐鲁番文献主要是汉语文献。敦煌文献中有印版，吐鲁番文书则罕见。这是二者的区别。

在中古时期，敦煌与吐鲁番有着相似的历史，相似的文化，关系极其近密。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过程中，常常将两者并称为敦煌、吐鲁番学，也有人直接将二者称为“敦煌学”。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地理、艺术、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社会、建筑、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领域。

（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出版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文献的整理（主要是校），其次才是对文献内容的研究。这是因为这两类文献以抄写为主，其文字状况如郭在贻所概括的那样，“楷隶行草，纷然杂陈；或繁或简，变化无端，点画偏旁，任意增损，可谓讹俗满纸，令人眼花缭乱”^①。荣新江在谈到归义军史研究困难之一时说：“首先要象处理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一样，做文字的校录工作，将残文书整理成可读的文献，然后才能参互对比，进行历史研究。”^②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文献整理，研究就难以进行，文献整理质量的高下，往往决定着研究结论的可靠与否。就现有敦煌、吐鲁番文献词义考释方面出现问题的情况来看，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认准

① 郭在贻：《郭在贻敦煌学论集》，13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②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